

人类追求平等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平等啊平等，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Equal Is Unfair

America's Misguided Fight Against Income Inequality



平等不公正

美国被误导的收入不平等斗争

[美] 唐·沃特金斯 亚龙·布鲁克 著

启蒙编译所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Don Watkins Yaron Brook

Equal Is Unfair: America's Misguided Fight Against Income Inequality

平等不公正

美国被误导的收入不平等斗争

〔美〕唐·沃特金斯 亚龙·布鲁克 著

启蒙编译所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平等不公正：美国被误导的收入不平等斗争 / (美)
唐·沃特金斯, (美) 亚龙·布鲁克著; 启蒙编译所译.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9

书名原文: Equal Is Unfair: America's Misguided Fight
Against Income Inequality

ISBN 978-7-5520-2468-5

I. ①平… II. ①唐… ②亚… ③启… III. ①社会问
题—研究—美国 IV. ①D771.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09791 号

启蒙文库系启蒙编译所旗下品牌

本书文本、印制、版权、宣传等事宜, 请联系: qmbys@qq.com

EQUAL IS UNFAIR: America's Misguided Fight Against Income Inequality by Don Watkins and Yaron Brook

Copyright © 2016 by Don Watkins and Yaron Brook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 2018 by Wuhan Enlightenment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urtis Brown Ltd. through Bardou-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9-2018-820

平等不公正：美国被误导的收入不平等斗争

著 者: [美] 唐·沃特金斯 亚龙·布鲁克

译 者: 启蒙编译所

责任编辑: 路 晓 唐云松

出版人: 余 凌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76

电话总机 021-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5307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p.org.cn

印 刷: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毫米 1/32 开

印 张: 9.875 插 页: 3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2468-5 / D · 507

定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部分 理解不平等争议

第一章 谁关心不平等 / 3

第二章 考查“不平等故事” / 21

第二部分 发现美国梦

第三章 机会之地 / 59

第四章 进步的条件 / 95

第三部分 背叛机会

第五章 机会战争 / 135

第六章 财富创造者与财富占有者 / 167

第七章 理解反不平等运动 / 203

结 论 如何挽救美国梦 / 252

致 谢 / 264

注 释 / 265

译名对照表 / 303

第一部分
理解不平等争议

第一章 谁关心不平等

当代的决定性挑战？

几年前，本书作者之一亚龙·布鲁克受邀在弗吉尼亚州共和党代表大会上做专题演讲。下面是他演讲的开场：

我不够幸运，没能生下来就是美国公民。成为美国公民是我的选择。我是移民，在以色列出生、长大。我在以色列服兵役时遇到了我的妻子，那时她 27 岁。结束为国家的战斗后，我们结了婚。结婚时，我们坐下来谈，要知道，人只能活一次，我们想过上充实的生活，想去能享受自由的地方，去能充分发挥生命价值的地方，去能追求幸福的地方，去能让我们尽力养育孩子的地方。于是我们放眼世界。我们不委身于任何特定的地方，所以我们放眼世界说：“我们要去哪儿？”我们选择美国，是因为这个国家是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也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家。^[1]

亚龙在做决定前考虑了很多问题，却从未考虑过一个问题：美国存在多少经济不平等？和他之前数以百万计的人一样，亚龙

来美国的目的是让自己和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他想体验美国梦，在他的能力和雄心所能达到的范围内，自由安排人生道路并获得提升。他会进入美国收入最高的1%，还是处于最底层的10%？他从没想过要问这个问题，如果有人问过他，他的答案也会是：“那又如何？”

在这一点上，亚龙并非特例。各种民意调查一致表明，美国人对不平等的关注度非常低。^[2]即使是住在密歇根农村和辛苦偿还住房贷款的人，似乎也不在意几百公里外的纽约城有一小撮乘私人飞机、在 Nobu 餐厅用餐的对冲基金经理。我们真正深切关心的是自己获取更好生活的机会，而且我们很可能没有夜不能寐，而是会庆贺一些人可以取得自己做梦都想不到的成功。

但是我们几乎每天都在被告知，我们对经济不平等的态度是错误的——即使我们不担心自己身处不平等之中，我们也应该在在意它，因为它是对美国梦的威胁。奥巴马总统在一次极受欢迎的演讲中称：“当代的决定性挑战”是“不平等的危险加剧以及向上层的流动缺乏，后者已经威胁到中产阶级美国的契约——（承诺）你只要努力工作，就有机会出人头地”。^[3]

在这个问题上，奥巴马的观点并非个例。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撰文称：“大量且不断加剧的不平等已经损害了美国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可持续性：富者愈富，其他人则陷入（看起来）与美国梦不一致的困境。”^[4]记者蒂莫西·诺亚（Timothy Noah）警告：“美国当前的收入分配比乌拉圭、尼加拉瓜、圭亚那和委内瑞拉还要不均，几乎跟阿根廷处在同一水平上……从经济角度讲，这个世界上最富

裕的国家越来越像香蕉共和国^①。”^[5]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 (Thomas Piketty) 在他的著作《21 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中警告,“资本主义自发地产生了恣意且不可持续的不平等,从根本上破坏了民主社会赖以为基础的精英价值”,因此,“滑向寡头政治的风险是现实存在的,对美国的走向保持乐观是毫无道理的”。^[6] 据奥巴马说,这会导致“不平等的增加和流动性的减弱相结合,对美国梦、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我们在全局的立场产生了根本性威胁”。^[7]

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 (James Truslow Adams) 在 1931 年出版的著作《美国史诗》(*The Epic of America*) 中提出了“美国梦”,该词进入词典,指的是“梦想在一片土地上,人人都应该生活得更好、更富足、更充实,人人都凭能力和成就获取机会”。^[8] “美国梦”关乎机会——追求更好生活的机会,在这里,一个人取得成功所凭借的除了能力和付出之外无他,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创新者也能引领人类不断取得进步。

从表面上看,这个梦本身似乎就蕴含了巨大的不平等:在一片你可以任意驰骋的土地上,一些人会获得巨大的机会,许多人会获得体面的生活,而余下的人则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失败。尽管如此,还是有批评者坚持认为经济不平等与美国梦格格不入。他们的具体理由各有不同,但可以归结为三个基本主张:不平等

① 最初指 20 世纪上半叶的洪都拉斯。当时的洪都拉斯经济受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等大公司控制,生产单一作物香蕉。后来,“香蕉共和国”被用来泛指经济体系单一,政治经济受外国势力干涉,国内腐败不稳定的国家。——译者注

无论如何都会与经济流动性、经济进步和公正发生冲突。

1. 不平等 vs. 流动性。批评者认为，机会的最佳代理人是经济流动性。评估流动性有不同的方式，但他们声称，无论怎么评估，事实就是，在美国，如果你生在穷人家，就可能会一直穷下去，生在富人家，就可能会一直富下去。一些批评者认为，让不平等增加与流动性受限的是同一股力量，比如工会的衰退或最低工资的下降。另一些人将不平等视为流动性降低的原因——举个例子，在美国，富人能将子女送到穷人上不起的贵族学校。在许多情况下，不平等增加与流动性下降之间的联系从未得到过充分阐明：例如，我们只是听说高度不平等的美国比欧洲国家经济流动性低，我们如果能以欧洲的社会福利制度塑造自己，流动性便可提高。

2. 不平等 vs. 进步。批评者认为，经济不平等与经济进步格格不入。其主要论点是：过去 40 年，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经历了惊人的上升，富者愈富，穷人和中产阶级止步不前。有人指出，不平等的增加是一种显著症状，其中潜藏着经济问题，比如偏向“富人”的税收和调控政策。另一些人认为，不平等造成经济进步放缓，依据是高度不平等与低增长之间在统计学上的相关性。对不平等如何使经济增长放缓的解释比比皆是，从不平等降低了可能拉动经济增长的消费性支出，到不平等使工人幸福感减少进而降低生产力，不一而足。

3. 不平等 vs. 公正。我们重视机会的一个原因是它反映了我们对公正的承诺。我们相信，一个人取得成功的大小应该跟他的付出联系起来，如果你撒谎、欺骗或者偷盗——或者仅仅是做了

蠢事——你的“优越地位”不应该成为你免于失败的保护伞。但批评者称，不平等的增加与公正格格不入。

有时人们说，不平等给了“富人”权力来操纵政治系统以利于自身，从而破坏了公正。奥巴马总统对我们说：“普通人不可能写大额竞选支票或雇佣昂贵的说书者和律师，去牺牲他人利益弄到对自己有利的政策。”^[9] 有时人们又认为，不断增加的不平等是不公正（injustice）造成的结果。斯蒂格利茨认为：“处在收入顶层的富人大多是靠剥削获得财富的积累……处在收入底层的穷人大多是由于经济歧视，以及没有给将近 1/5 的穷人家的孩子提供足够的教育和医疗。”^[10]

然而这里的潜台词通常是：经济不平等，至少在超过某个临界点后，存在其固有的不公正性。按照奥巴马的说法，“上层的 10% 不再（像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那样）拿走我们 1/3 的收入——他们现在拿走一半。过去，普通 CEO 的收入是普通工人的 20 到 30 倍，如今的 CEO 收入是普通工人的 273 倍以上。与此同时，最顶层 1% 的家庭的净资产比普通家庭高 288 倍，创了这个国家的纪录。”^[11] 总统认为，这些比率不言而喻，是不正当的。

无论怎么解释批评意见，结论都是相同的：如果我们关心“美国梦”，我们就必须支撑底层群体，拉低顶层群体，从而减少不平等。所以，批评不平等的人建议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支持工会，同时还主张最高边际所得税率远高于 50%，巨额遗产税，大量旨在限制大企业的法规，给 CEO 设置的工资上限，限制富人政治言论的竞选资金法，等等，这里只列举了他们的一小部分方

案。在皮凯蒂的抢手畅销书《21世纪资本论》中，对抗不平等的首要建议是每年最大税率为10%的年度全球财富税，还有高达80%的所谓“充公”的最高边际所得税率。^[12]

有人认为，即便如此也还不够。有些批评经济不平等的人基本上不关心对机会的影响，即便那样意味着削弱经济进步，也要把社会拉低到同一水平。此类具有代表性的批评之作是《精神层面》（*The Spirit Level*），其作者理查德·威尔金森（Richard Wilkinson）和凯特·皮克特（Kate Pickett）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在富裕国家中严格限制经济增长”，因为“一旦我们有了足够的生活必需品，相对性就变得重要了”。^[13]畅销书作家娜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也有类似的主张，她认为要真正解决不平等的问题，我们必须完全抛弃资本主义，放弃经济进步的想法，拥抱一种去中心化的社会主义土地形式。^[14]左翼广播主持人汤姆·哈特曼（Thom Hartmann）的解决办法仅仅是禁止亿万富翁出现：“要我说，是时候禁止亿万富翁了，办法就是对任何超过999 999 999美元的财富征收100%的税。相信我，在一个没有亿万富翁的国度，我们都会过得更好。”^[15]

我们应该怀疑不平等吗

不平等的批评者们描绘了一幅黑暗的现代美国图景——它是如此黑暗，我们许多人在日常经验中根本认不出来——而且提出了令很多人深感困惑的解决方案。与此同时，这些批评者打算解决深切关注的问题，而且他们提出主张所靠的证据似乎颇有说服力——统计数据、研究结果，以及一些当代的杰出知识分子和记

者的著作。我们希望美国是一片有着无限机会的土地，因此他们的主张应该得到严肃对待。

但从一开始，对他们的主张进行客观评估就存在一个巨大的障碍：也就是说，不平等的批评者们往讨论中偷偷带入了—种财富观，心照不宣地假设经济不平等是不公正的。

“定量馅饼”假设。不平等的批评者谈到经济上的成功，经常说得好像是一场固定和博弈。供应的财富只有这么多，所以不平等就相当于证明有人得到了别人的损失。他们认为“富人靠着损害跌到底层的人升到顶层的”，斯蒂格利茨写道：

可以根据馅饼片来考虑发生了什么。如果平分馅饼，每个人都会得到同样大小的一块，那顶层的1%得到的就是馅饼的1%。实际上，他们得到的是非常大的一块，大约是整个馅饼的1/5。这就意味着每个人得到的馅饼变小了。^[16]

这里忽略掉的是生产这个事实。如果馅饼是持续扩大的（因为人一直在创造更多的财富），那么一个人的所得就不必牺牲他人的利益。这并不是说你无法以损害他人的利益（比如偷窃他人的馅饼）变得更富有，但不平等本身的增加没有给我们理由去猜测有人遭到了抢夺、剥削，或者更糟的情况。

我们一直在意的不平等跟贫穷并不是一回事。当蒂莫西·诺亚这类人抱怨“美国的收入分配现在比乌拉圭、尼加拉瓜、圭亚那和委内瑞拉还要不均”时，却假装如下事实无关紧要：几乎每个美国人都比这些国家的公民富裕。经济不平等与广泛的富裕是

完全匹配的，不平等的增加与一个绝大多数公民都变得更富裕的社会是完全匹配的。如果最穷的美国人的收入翻了两番，而最富裕的美国人的收入翻了三番，即便每个人都过得比以前更优渥，不平等还是会极大地增加。不平等指的不是剥夺，而是差异，差异本身并不存在可疑或异议。

“集体馅饼”假设。奥巴马总统在讲到不平等时说：“上层的10%不再拿走我们1/3的收入——他们现在拿走一半。”^[17]（引文着重号系作者所加）这类措辞在关于不平等的讨论中很流行，它假设财富实际上是个社会馅饼，这个馅饼由“整个社会”创造，也应该被公正地分配。什么是公正？在《赢家通吃的社会》（*The Winner Take All Society*）一书中，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和菲利普·库克（Philip Cook）以一个简单的思想实验为起点来讨论不平等。“想象一下，你和两个朋友被告知，某个匿名的捐赠人捐献了3万美元，要在你们三人中间分配。你会怎么分？如果你像大多数人一样，你就会立刻提出平分——每人1万美元。”^[18]在他们看来，如果这个馅饼属于“我们所有人”，那么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公正要求我们平分——不允许一个小集团蛮横地取走“我们”收入的1/3。

但是，尽管我们能轻松地说出一个社会有多少财富，财富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属于整个国家的馅饼。它包含具体的个人（通常在集体中共同工作）创造的具体价值，属于具体的个人。财富并不是由社会分配的：它由创造它的人生产和交换。为了分配财富，社会首先必须将它从创造它的人手上拿过来。

这个行为极大地改变了等式。个人在创造某物时，并没有假

设最后应该平等共享。如果鲁滨逊和星期五在一座岛上，鲁滨逊种了7棵南瓜，星期五种了3棵南瓜，那么鲁滨逊就没有夺走更大份的（南瓜）馅饼。他只是创造的财富更多，并没有让星期五过得更糟。说鲁滨逊拿走了岛上70%的财富是不诚实的。

所以很显然，关于财富的定量馅饼假设和集体馅饼假设会导致我们带着怀疑的眼光看待经济不平等。如果财富是一块定量馅饼或由作为整体的社会烹制的馅饼，那么由此得出结论：经济平等是理想，背离这种理想貌似是不公正的，而且需要得到辩护。按照皮凯蒂所说，“不平等本身并不一定是坏的”，“关键问题是判断它是否正当，是否有理”。^[19]

但如果财富是个人创造的，那么就没有理由指望我们应向经济平等靠拢。我们看看构成社会的实实在在的个体就不证自明了，人类几乎在每一个方面都是不平等的：体重、力量、智力、美丑、节俭程度、野心、职业道德、道德品质等等。这些差异必然会在经济状况上带来巨大的差别——没有理由用怀疑的眼光看待这些差异，更不用说提出警告了。

如果我们认为财富是个人生产的，那么就没有理由认为经济平等是一种理想，而经济不平等需要专门进行辩护。这不意味着关于流动性、经济进步以及公正的主张必然是错的，这一点还有待观察。但的确意味着我们没理由一开始就怀疑经济不平等与美国梦格格不入。相反，如果我们看看是什么让美国成为机会之地，就有理由相信机会与经济不平等密切相关。

机会理想

如果你想弄明白是什么让美国成为机会之地，以及什么威胁了当今社会的机会，那么你要了解的是：美国是第一个鼓励并保护个人追求成功的国家。

历史上，尤其是在欧洲，大多数社会所渴望的世俗理想是过上闲暇的生活——不是美国大量提供的一天艰苦劳作后的放松，而是无所事事的生活。这种理想的典型例子是绅士贵族，这类人不沾染半点生财之事。^[20] 美国人的态度是不同的。即使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这个新世界的访客就被震惊到了，许许多多的美国人，“他们的‘全部想法’就是‘利润和赚钱’”。^[21] 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法裔美国人 J. 赫克托·圣约翰·克雷夫科尔（J. Hector St. John de Crèvecoeur）在《一个美国农民的信》（*Letters from an American Farmer*）中说：“我们受去掉了枷锁和束缚的勤劳精神鼓舞，因为每个人都是为自己工作……在这里，他的勤劳所得随着他的劳动的增加而增长；他的劳动建立在自利的自然基础上：还有比这更强大的诱惑吗？”^[22]

到 19 世纪中叶，这种对生产成就的关注已植根于美国精神之中。有人曾这样评论：

去北方各州的人几乎毫无例外地都说起那些拥护杰克逊的美国人那沉浸的面庞和近乎疯狂的买卖，抱怨餐食粗糙，没空消遣，所有人都追求查尔斯·狄更斯所咒骂的“万能的美元”。^[23]

如今，我们很难理解在美国最初的一个半世纪中，生产性工作在美国生活中处于多么中心的位置。那个时代的人们对新桥梁、新火车投入使用所表现出的热情，与我们如今对“超级碗”的热情如出一辙。流行音乐歌颂的是电话、汽车之类的技术成就。丹尼尔·尤金（Daniel Yergin）在他的19世纪后期石油史中指出：“美国人随着‘美国石油波尔卡’和‘石油狂奔’起舞，唱的歌是‘著名石油公司’和‘石油着迷’。”^[24]

维也纳移民弗朗西斯·格伦德（Francis Grund）在19世纪初观察美国对生产成就的痴迷时总结道：

地球上没有谁能像美利坚合众国的居民那样把工作当成乐趣，把勤勉当作消遣。积极参与工作不仅是他们快乐的源泉，而且是他们国家伟大的基石，没有它，他们绝对是悲惨的……他们知道懒惰的恐怖。工作就是美国人的灵魂：他们追求工作，不是把工作当成为自己谋利，让家人过上舒适生活的工具，而是作为全人类幸福的源泉……好比整个美国就是一个巨大的车间，入口处有着鲜艳的题词“不工作禁止入内”。^[25]

这种独特的美国精神受到独特的美国政体的支持。在美国建国之前，每一套政体都想当然地认为一些人有权统治其他人，以所谓“更大的善”的名义，随时拿走他们的自由和财产——毕竟，欧洲贵族借此过上了闲暇的生活。这种体制被用来抵御有意挑战社会传统的局外人或改革者，后者往往会创造出新的体制，而且